

一份十几年前的报纸(1998年2月20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上的一篇文章说:牙是非洲大象在野外生活中得心应手的工具。然而有4%左右的非洲象自出生时就没有象牙。目前,非洲某些地区的无牙象的比例已猛增了5倍,在七八十年代90%的乌干达非洲象死于偷猎者枪下。偷猎者的目标是象牙,而罕见的无牙象便年复一年地在枪口下偷生,并幸运地将自己的变异基因一代一代遗传下去。这是非洲象的自然反应。它们已经意识到象牙给它们带来了危险,没有象牙的后代才能平安长大。

有朝一日大象虽然没有绝种,但都没有了象牙,不知人类会做何感想?

现在情况如何呢?恐怕还是不容乐观吧!

2010年8月23日新华社消息: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当天发表声明说,肯尼亚海关22日晚间在内罗毕乔莫·肯雅塔国际机场截获了总重达2吨、共317件野生象牙以及5件野生犀牛角,这是肯尼亚近年来截获的最大一批走私象牙。

又一份旧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:德国的柏林墙和朝鲜半岛的三八线成了生态区。原柏林墙附近地区已成为一个异常丰富的动植物生态区。围墙被推倒7年后,这片宽100米、长150公里的“无人地带”依然保护完好。数以百计的外来植物,包括某些通常只有在地中海及波罗的海附近地区才能见到的物种,都在这一带繁殖。狐狸和野猪在这片接近市中心的林地出没,已成为轰动社会的大新闻。横亘于三八线两侧的朝鲜半岛南北之间非军事区,宽约9公里,长约270公里,两侧还各有一个约5公里宽的缓冲区,停战40多年以来,只有极少数士兵曾经进入这个无人区。1987年科学家实地调查,初步发现41种本土植物和40种稀有植物,16种本土和8种稀有鱼类。另外,他还发现14种以前从未在此地发现的物种,如东北虎、北极熊等。

不知现在这两块“净土”是否还保持着20多年前的良好状态?

2010年8月22日《北京青年报》刊载刘丽娜《空运萤火虫与短暂的浪漫》的文章说:“近日,好友从广州白云山度假回来,说七夕那晚,她感受了一回‘浪漫’:白云山风景区从云南西双版纳空运了1000只萤火虫来为景点创造‘气氛’,这样的做法堪称用心良苦,也实在有点奢侈。据说白云山没有开发之前,一到夏天,萤火虫随处可见,现在只能空运了。但空运不来生态环境,没有良好的环境,哪儿来让人陶醉和留恋的童话般世界?这种人为制造的浪漫,只能是‘昙花一现’。”

英国作家小泉八云(拉甫卡迪沃·赫恩)的散文名篇《草百灵》,充满了对弱小生命的关注,通过细腻的描述,特别是突出视觉、听觉的官能感受,从一只蚊子般的蟋蟀的死亡吟唱,揭示出震撼人心的爱的力量。他深情地写道:“一个极小的生命的熄灭困扰我,超过了我认为可能的程度……当然,仅仅习惯地考虑一个生物的需要——即使是一只蟋蟀的需要——不知不觉地,也可以产生出一种富于想象的乐趣,一种恋恋不舍的爱好。只有在这种关系割裂的时候,人才意识到。我深深感觉到,在夜深人静的时刻,那个纤细的声音的魅力——它表明依赖于我的意愿和自私的乐趣者一个短暂的生命存在,如同依赖一个神明的恩惠——也告诉我在那小小的笼子里的灵魂,以及在我的身体内的灵魂,在无限的生命深渊里永远是一样的,并无高低之分。”

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在他的散文《叶飘零》中写道:“我们的地球对待一切都是公正无私的,它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欢乐赐给所有生存的人、所有的植物、所有有生命的东西,而这最为珍贵的无私赐予的欢乐就是生命本身!但是有生命之物,首先是指所谓理性的动物所赐予的生命的幸福。人们总是不满足平庸的生活、等闲的快乐,总是要在甘甜里面增添些苦涩作为佐料,甚至添加的是血腥和狂热。人们对自己施以私利:使用武器,相互残杀,但是使用最多的杀人手段是用言语,用上帝崇拜和偶像崇拜,而这上帝和偶像正是人们自己树立的,他们跪倒在地上亲吻上帝和偶像的皮鞭,生怕上帝和偶像突然下令砍下他们的头颅,或者上帝从他们手里夺走面包,撕下一块大度地扔到路旁的尘埃里。”

马克思有句名言:“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。”恩格斯在写《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》一文时,就参阅了马克思向他推荐的卡·弗里斯的著作《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》一书,在引用了该著中提供的生态失衡的材料后写道:“我们必须时时记住:我们统治自然界,决不象征服统治异民族一样,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——相反地,我们连同我们的肉、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、存在于自然界的”,“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,人们越会重新不仅感觉到,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,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、人类和自然、灵魂与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、反自然的观点,也就是不可能存在了。”

实践是分化自然,也是统一自然的的活动;同样的,实践对人来说是自身肯定,也是自身否定即超越自我的活动。实践在把人从自然分化出来的同时,就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了新的更加紧密的一体关系。人之为人的本质不但体现于人与动物的区别性质,更体现在人与动物的一体性质中。人以何种物为自身的对象,这种对象关系就表征着人是何种样的人。

亲爱的朋友,你是何种样的人。

态漂亮的大丁香。每年4月,它们开一树洁白的花,就是在夜里也明亮得晃眼。它们还是鸟儿们的游乐场。丁香树过后,我种了玉兰、腊梅、红枫、紫薇、杨梅、龙枣、冬枣、白枣、白沙枇杷、青种枇杷、牛奶柿、扁柿、金桔、柚子、橙子、梨、苹果、樱桃、水蜜桃……我知道树能感知人的情绪,或者说,它们能神奇地听懂人的语言。有一棵桔子树,第一年结果,皮厚肉酸,一肚子籽。第二年还是。我就威胁它说,你再这样结果子,我明年就把你挖掉。结果,第三年,它结的果子皮薄肉甜,肉里没有籽。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少,你就觉得理所当然,然后你就与它们成为一体。我有一次与朋友谈起这些事,有一位也种树的朋友肯定地说,树,肯定听得懂人的语言。我要是写菜们,一定写树们。

听得懂我的语言的,还有鸡鸭们。鸡叫麻花,鸭子,一只叫大卡,一只叫小卡。麻雀睡觉睡在栏杆上,来去自由,不回窝下蛋,全凭它当时的想法。大卡与小卡,一年有360天,天天下蛋,不过有时候我也得找它们的蛋。它们喜欢在户外逛。我对它们发火责骂,它们会吓得逃远。

我还认识一条青虫。这条青虫长得很大了,吃葡萄的叶子。我捉住它,它对我吐红色的小舌头。它头上还长了一只青角,样子凶恶,但我知道它是虚张声势,它要保命。所以我就放了它,扔到与葡萄树一墙之隔的绿化带里。第二天,我在葡萄树上又看见它了,它夜里翻山越岭地回来了。我已认识它,但我不能让它在这里。这次我把它流放到远处的树林里……三年前的事了,我还记得它的样子。

有一次夜里我回家,看见金花对着外墙吼。我打开电筒一看,是一只刺猬偷吃猫粮。它站在猫粮盆子里,脸朝着墙,双手向上就像投降,肚皮贴在墙上。它也知道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。我后来见过它几次。它不怕我,我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,它在路边的落叶里窜来窜去,故意弄得动静很大。

我的院子里鸟儿很多,最多的是麻雀、野鸽子和乌鸦,它们吃狗猫鸡鸭的东西,它们成群结队,互相招呼,吃得一个个滚瓜溜圆。我觉得它们可能已经编了一首鸟歌唱起来:有一个老太婆,心肠真不错。她家东西多,我们去啄啄……

我认识了这么多东西,当然我也从此认识了我自己。我认识了自己,从此有了关于吴郭城和花码头镇的系列故事。此篇小文,谈的是我7年来的生活状态,风花雪月,喜怒哀乐……处处文学。

山高水远,好作书斋。但远方是什么?所有的远方都是一个井吧?我在井里观天,井里或者就是远方?

#### 本栏目与《作家通讯》合办

## 山高水远

□ 叶弥

■ 生活·写作

她们发现路途不对,一哄而上围住驾驶员,问,你想把我们朝什么地方开?驾驶员也不着急,慢悠悠地问,你们想坐几路车?她们说某某路车。驾驶员说,这不是某某路车。三位老太便喊起来,停车停车。驾驶员说,好吧,马上就到站了。到站了你们就下车吧。

除了有趣好玩的,还有温暖励志的故事。7年前,我刚在这里坐公交车时,我发现本地人并不敬老,年轻力壮的男人女人都不给年老体衰的老年让座。可能的原因是公交车班次太少,乘车的人大多是长时间的路途。我遵循着“苏州”人的习惯,给老人们让座,有时候,我劝说青壮年给老人们让座。我热心地做着这件事,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,心里十分沮丧。有一次,我一上车,就有一位奶奶在后面招呼我过去坐,她让她的孙子给我让座。这天我正病着,就过去坐了。过了一站路,有一位孕妇上车了,奶奶又站起来招呼孕妇,给她让座了。然后,奶奶对我说,你以前让过我座位,我现在让你们。也许我是病着,一听她的话,脆弱得不行,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

小区的西边是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,路边是一片稻田。小区北边紧挨着一大片菜地,菜地边是一条小土路,小土路边是一个村庄,村庄里有小河、庙、狗、摩托车。小区南边是低洼的水泊,以前应是一条不小的河。岁月变更,它成了一个边缘模糊、水底起伏不平的小水洼。没有水的地方很快长了茅草、蒿草、水芹、野芹菜、野薄荷、红蓼、菖蒲、鬼针草……然后有许多人家在这里开荒,种上了蔬菜瓜果,一小池一小池的,精致而用心地种着,就如绣花一样。我在这里欣赏野草野菜,再欣赏蔬菜瓜果。叫不出名的鸟儿从头顶飞过,去觅食或寻友。江南多雨,春夏秋三季,每次下雨,不论积水多寡,这片生机勃勃的低洼地便会奏响蛙鸣大合唱。那时候,所有的夜晚都是宁静的。它们在寂静的夜里纵情叫喊,叫声如鼓。每当我在熟睡中被它们叫醒,不知身在何处,但内心是安宁的,遗憾不能认识它们。

夜里,常有做夜班的打工妹打工仔从我屋边走过。他们经常说说笑笑,有时候会唱着歌走过,有时候会哭泣着走过。每次我被他们吵醒,不知身在何处,但内心是安宁的,遗憾不能认识他们。

到了这里,我没有什么可着急的。我像当地人一样,夜里也不用窗帘了。只有“苏

州”城里人,才会用窗帘把自己遮得密不透风。白天,我泡一杯茶,坐在屋外,看天上的云,看群飞的或孤飞的鸟,看着看着,心随之飘荡,不知身在何处,但内心是安宁的,遗憾不能认识它们。

我首先认识了游荡在这里的野猫野狗。为生存努力的它们,比宠物们更有智慧,更善于表达感情。我是被它们感动了才去收留它们中的老弱病残。我救它们,它们也救我。我对许多人说过,我会写它们,把它们写成一部小说。

然后我认识了许多野草野菜。我开始整理我的院子,土地珍贵,我没有把院子用各种石头填没,它现在看上去一片杂乱,可绝对不是荒芜。鸭跖草看上去是一位妆容精致的小妇人,我总是因为它们的小蓝花而舍不得拔掉它们。龙葵容易生长,它个子高挑,引人注目,挂着一身圆圆的碧青珠子,我总是为了它们那些娇嫩可爱的满身珠子而不舍得拔掉它们。车前草长得到处都是,身材短粗,脚跟坚实有力,是个不折不扣的农夫。灰灰菜是小家碧玉。土参如皇后一样高贵。奶浆草是野菜里的胖妞,泽漆长得与它有点像,也是身体里一包浆液,而且它们经常会长在一起,但奶浆草可以吃,泽漆的体液有毒。苍耳子的果实毛茸茸的一身刺,是个顽皮孩子。马兰头的小蓝花使它有点小资情调,小蓟满身是嫩柔的刺,我好像从未见过它们开花,应当是青春期的男孩。野芹菜开小小的黄花,配上它曼妙的样子,说它是少女没人会反对。酢浆草也是开小黄花的,可是它们与野芹菜的样子不一样,它们乱糟糟地长成一堆,生命力顽强,怎么看也是乡村憨姑娘。荨麻的叶子与众不同,手感和形状都像桑叶……它们与我相邻,是我渐渐认识的朋友,拔掉它们,让我很心疼。所幸野草拔不净,春风吹又生。我不用除草剂,除草剂让土地板结如铁,让许多野菜野草断子绝孙……如果我要写小狗小猫,我也一定要写它们。

我要种蔬菜了。几年下来,我认识的蔬菜有一大堆,甜菜、韭菜、蒜菜、辣椒、蕃茄、丝瓜、豆角、茼蒿、香菜、菠菜……你也认识它们,可我与你不,我熟知它们的特性,它们爱干燥还是潮湿,爱阴凉还是阳光,爱肥料还是爱寡淡……我如果要写野菜野草,我一定也要写它们。

不能没有树。我一住进来就种了一棵姿

我从从小就喜欢做流浪的梦,跟着船队漫无边际地走。或者上了火车,一直驶向不知名的远方,夜里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,怀着恐惧和敬畏注视车窗外面的黑色世界。

后来,我有了孩子。孩子会坐自行车的时候,吃过晚餐,我会把他放在自行车上,骑到火车站,听火车轰鸣着进站,又一声汽笛离去。每一辆火车都是我的朋友。我喜欢想象远方,虽然我不知远方有什么。我喜欢山高水远,虽然我不知山高水远的地方有什么。

再后来,孩子大了,去了远方。我也从来不曾到过我的“远方”,我一直在我的家乡,用心勾勒我的远方。

过了不惑之年,有一天,我搬离了市中心,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购置了住房,这是一个镇乡交界之处。对于我来说,是一个陌生的地方,在搬来住之前,我从没有到过这里。有一辆公交车经过这里,我坐着公交进城一趟,路上起码要花3个小时左右。这里也说着软软的吴方言,但用词与城里不一样。最有意思的是,当地人称城里为“苏州”,进城叫“去苏州”。镇上没有桶装矿泉水,没有管道煤气,没有狗粮猫粮,没有健身房,没有美容院,没有冰冻食品,没有我需要的某些品牌的女性用品。镇上有一家卫生院,一个只有两个人的邮局,一个江苏农业银行。大家不爱用布窗帘,即使是别墅,家里也不装布窗帘,从别墅边走来走去的人,都看得见家里人在干什么。说话和做事都慢……经常断电,最高记录是一天断了十多次电,但大家无所谓。只有我为了一天断十多次电这种小事火冒三丈。

为了买猫粮和购置一些日用品,我需要进城。我回来的时候,熟悉的人会与我打招呼,去苏州啊?

是啊,我是去苏州了。我恍惚间,有点山高水远的感觉了,也有点明白搬离闹市的动机。陌生安静的地方,有远方的感觉吧。我小时候坐火车时看着外面的黑夜,是不是就有这么一块陌生的地方召唤我?

从此没有再进过美容院,任凭皮肤风吹日晒。我的头发我做主,太长了,把头发反过来披散在脸前,顺着半圆形一刀剪下来,也算是精干的短发了。

坐公交车的日子碰到许多有趣的事。有一次,冬夜,我们就说,开吧,人早下了。驾驶员说,我眼睛一直盯着监视屏,没有看见有人下车啊。是不是见鬼了啊?他猛地发动了汽车,疯一般地在空无一物的路上开着。

这里的老人大多不识字,只要公交车来,便胡乱地上。有一次,三位老太太上来了,肩挑手提,全是蔬菜。车子开了一会儿,

董辛名是董每戡的三弟,但名声不如其兄。盖因董辛名抗战之后长期在温州地区从事剧运,在文化中心城市待的时间不长。但是他在戏剧上训练有素,修养极高,不仅对温州的戏剧运动,而且对温州的整个文化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。

董辛名,1912年3月25日生于浙江温州瓯海潘桥镇横屿头村敬修堂,谱名国铭,董每戡三弟,6岁入私塾,1924年入温州艺文中学,1928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,与赵丹同学。董辛名对戏剧、电影一向兴趣浓厚,报考电影公司被录取,恰逢赵丹来玩,大家一致认为赵丹搞电影比搞绘画更适合,赵丹遂持董辛名的录取通知书前去报到。与胞兄一起从事左翼戏剧活动,与金山相交最笃。1934年去日本,1935年入日本大学文学艺术学院电影和戏剧编导专业。在日本期间与聂耳交情极好,聂耳约他一起游泳,董辛名因事未去,聂耳就是在那次游泳中不幸溺亡。

他最大的贡献是抗战期间对温州戏剧运动的推动。1937年后回国创办永嘉县老竹中心小学、温州工业职业学校,从事教育事业,并任永嘉抗战后援宣传队戏剧组组长,率流动剧团演出大量剧目。

1938年4月,他曾去武汉哥哥处担任编导,几个月后返回温州,搬演董每戡新剧《敌》。他又与胡今虚、莫洛等当选为战时剧人协会永嘉分会理事,组织多次公演。1939年又任前哨剧团温州公署的副团长和导演。前哨剧团几乎吸引了当时温州所有的进步文学青年,马骅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,林斤澜与他后来的夫人谷玉叶都是演员,唐湜也常常参与活动。

温州的戏剧活动与他根本分不开,他为许多剧团导过戏,指导过几乎所有温州的学生剧团,琦君曾在他指导下演繁漪。抗战胜利之后,他还继续在温州导了许多戏。除了当导演,他还写剧本、办戏剧培训班。1944年在温州艺术学校教戏剧,与方介堪同事。他还与唐湜、姚易非等人在《浙报》上办了好几种副刊。

1946年2月,他任永嘉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。1947年,任温州工业学校总务主任、永嘉工业学校校长。



远山近览

## 地方文艺的带头人董辛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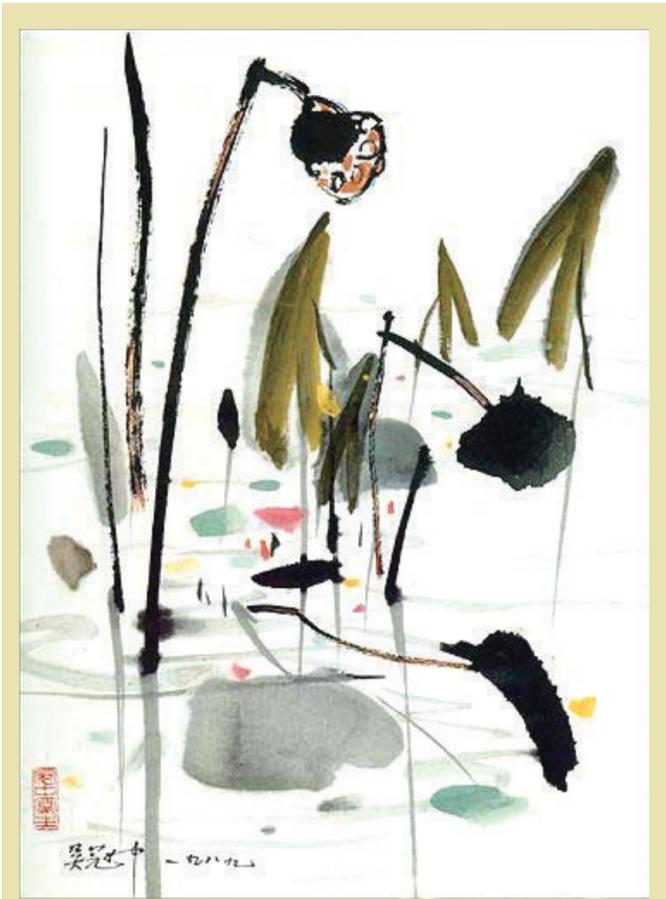
□ 郑绩

1949年底入华北人民革命政治研究院学习,结业后分配到原平原省平原师范学院(后并入河南大学)任政治教师。“文革”中被开除公职,流离失所,妻女被遣回温州,他自己困顿于洛阳郊区北窑村一个农家小院内。当时得了化脓性胸膜炎得不到治疗,他自己在胸前挂一个引流瓶接血水、脓水,却仍然和在长沙同样贫病交困的大哥通信讨论戏剧问题,董每戡的《说剧》手稿就是因为寄给他审看而幸免于被抄。1975年6月19日病逝。

谢德辉(即耶河)曾在《温州剧运》中写道:当时温州“大小数以百计的演出中,十分之八九系出自董辛名先生导演。抗战发生,董辛名先生自东京回国,即返乡乡,埋头于戏剧运动,不求名不求利,认真与负责的态度,值得称道。温州剧运能有这一点成绩,几乎全赖他的努力,大家认为他对剧运的功劳,是不可也不能磨灭的。”

董辛名的大哥董每戡大名鼎鼎,但董辛名其人却一直默默无闻,缘由他一直在家乡活动,并没处于上海、武汉、桂林等不同时期的文化中心。但是讲到地方文化史,他的名字却不能湮没。没有他,1937年以后的温州话剧不会如此发达。董辛名有着专业的戏剧学习功底,也有着前沿的戏剧眼光,还有丰富的戏剧界资源,这样一个人物,却一直在家乡活动,无论在现代文学的哪个分支中,都是很少见的。因此他有能力导演当时几乎所有的抗战剧目,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剧本,他都能导得有声有色,他能导曹禺,也能导口号剧。更为难得的是,面对温州观众,他可以非常巧妙地结合本土文化,完成戏剧的接受过程。他可以组织起不同类型的剧团,无论是学生剧社还是流动剧团,或者战区服务队,他都有一套相应的策略。他完全融入温州的文化环境和战时敌后的政治环境,又不失正统话剧的格调,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。

他的剧本创作有:象征默剧(哑剧)《最后的胜利》(1938年《先锋》),街头剧《敌人的善行》(1938年《游击》第十四期、十五期),话剧《游击队的母亲》(《先锋》月刊第五期,1939年游击文化出版社单行本),《照妖镜》(象征默剧)。



吴冠中作品

